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思潮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周晓虹

晚期马克思主义

——阿多诺，或辩证法的韧性

[美]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 著 李永红 译

Late Marxism

因对其所谓悲观主义的责备

西奥多·阿多诺

声誉遭到贬损

作者把阿多诺从其批评者和虚朋假友的魔爪中解救出来

向新一代的不同政见者介绍了阿多诺的思想

并且论证了辩证思维对当今批判与反抗的启发意义与实用性

是英语中所出现的、在哲学上

对阿多诺最为深奥和透彻的研究……

掷地有声、令人信服



南京大学出版社



当 代 学 术 棱 镜 译 丛 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思潮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周晓虹

晚期马克思主义

——阿多诺，或辩证法的韧性

[美]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 著 李永红 译

Late Marxism

Adorno, or, The Persistence of the Dialectic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期马克思主义/(美)杰姆逊著;李永红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张一兵主编)

ISBN 978 - 7 - 305 - 05580 - 5

I. 晚... II. ①杰... ②李... III.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7699 号

*

Late Marxism: Adorno, or, The Persistence of the Dialectic

by Fredric Jameson

© 1990 Fredric Jameson

Reprinted 2000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erso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4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4-165号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晚期马克思主义——阿多诺,或辩证法的韧性

[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 著

李永红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话 025-83594756 传真 025-83328362

网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信箱 nupressl@public1pttj.scn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0.75 字数 279 千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5580 - 5

定价 31.5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销售商联系调换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的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

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决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露域外学术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如宗神而不得不休矣。时文意顿然理齐，其妙不，质因
重本端。至后物尚宝否，而若得(moderat)月王而升圆山，是故莫要斯登
品前角以则更封也。秦因循全期，工革革而随朱阳起量中算。李不惑
本端，个底机运之变，而以所存今字游身行。非固想且其登白日古不
解矣”虽不

关于版本和翻译的提示

gratitudine V. r. (特一) 而得典之石，长于不有，以分外而，“恩交
掩者且并”介中“而以人或一气状去而为再斯理全而，“致躬”是不夷
ibimus) 而是直“呀”而介中“明常而——adserimus 而 adserimus
mAn”(mobil) 的致直“呀”而或同“最富而早宜，因流将某于山。”(one
或于而想书那长斯原，地那始而圣而从是而，“性里而”是不夷 adserimus
而

在本书中我通常重新翻译了出自阿多诺著作的引文(而不作专门说明)。起码来说，现有译文参差不齐：杰福考特(E. F. N. Jepphcotts)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并且更新近的，罗德尼·利物浦通(Rodney Livingstone)的《寻找瓦格纳》，是文雅的盎格鲁英语；约翰·卡明(John Cumming)的《启蒙辩证法》有着更浓的德国腔调，这是我喜欢的一种翻译方式，因为我与潘维茨(Pannwitz)一样相信，翻译者应当允许“他的语言受外来语言的强烈影响……[并且应当]借助外来语言扩展和深化他的语言”。尤其是，阿多诺的语句试图恢复错综关联的拉丁语变格的空间自由，恢复那庞大的先于主语的宾语，以及通过适当变化的关系代词来领会变性名词的某种游戏。在这里，语言交错(chiasmus)变成了由语句各部分之间的时空间隔产生的结构呼应；而且这些内部变动的结果是格言本身的闭合；它也确定是一种直率的行动，这行动不是趋于沉默而是转为其他行动和姿态。因而阿多诺应是在英语中打造了一个强有力的新德语语句结构的契机；并且这是我必须找到克里斯蒂安·赖恩哈德(Christian Lenhardt)的全部误导策略的缘由，这个《美学理论》的英语翻译者，他拆散了句子和段落而产生了一个文字畅通体面的大不列颠式文本，以至于我几乎不能辨认它[关于这一点可见他与鲍伯哈罗特-柬特尔(Bob Hulot-Kentor)的交流²]。

因此,不幸地,这整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任务将不得不重新完成。还须提及的是,由阿什顿(E. B. Ashton)所译的《否定的辩证法》版本更为不幸,其中最基本的术语被翻译错了,使全部段落(在译得很好的情况下它们已经是足够困难了)变得完全不可理解。被迫继续使用这个版本的读者,要记下这最严重的愚蠢错误:尤其,Tauschverhältnis 不是“实物交易”,而仅仅是“交换体系”(十分像在“交换价值”中一样);Vermittlung 决不是“传递”,而是要被再次确认为广为人知的“中介”[并且注意到 mittelbar 和 unmittelbar——通常即“中介的”和“直接的(immediate)”——出于某种原因,这里通常是“间接的”和“直接的(direct)”;Anschauung 决不是“可见性”,而是从翻译康德伊始,就被习惯性地翻译为“直觉”。这第一类错误(与有时对明显但不可理解地删除卡尔·柯尔施的名字一起)会导致一个妄想,就是相信这个翻译文本正是旨在产生一个“对我们的时代来说”后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阿多诺;然而这第三类,只能表明对哲学传统的彻底无知。依然,所有这些翻译偶然会撞击出火花,我有幸能以它们为据。

最常引用的作品页码在文本之内给出,首先是德文的,其次是英文的版本(即便英文版本所引处并未被使用),并且用以下缩略语标明:

- AT 《美学理论》(*Aesthetic Theorie*),《全集》第 7 卷(法兰克福:Suhrkamp,1970)
 DA 《启蒙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法兰克福:Fischer,1986,1944 年原版)
 DE 《辩证的启蒙》(*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约翰·卡明翻译(纽约:Herder & Herder,1972)
 MM 《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法兰克福:Suhrkamp,1986,1951 年原版)
 MM 《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杰福考特翻译(伦敦:Verso,1974)

- ND 《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 Dialektik*) (法兰克福: Suhrkamp, 1966 年原版)
(*Negative Dialectics*) 阿什顿翻译(纽约: Continuum, 1973)
- NL 《文学札记》(*Noten zur Literatur*) (法兰克福: Suhrkamp, 1981)
- PNM 《新音乐哲学》(*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 (法兰克福: Europäische Verlagsanatalt, 1958)
《现代音乐哲学》(*Philosophy of Modern Music*) 安妮·米彻尔和威斯雷·布劳姆斯特尔翻译(纽约: Seabury, 1973)
- W 《寻找瓦格纳》(*Versuch über Wagner*) (法兰克福: Suhrkamp, 1952)
(*In Search of Wagner*) 罗德尼·利物浦斯通翻译(伦敦: Verso, 1981)

目 录

1 /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总序	123
1 / 关于版本和翻译的提示	102
1 / 导论 时间川流中的阿多诺	102
13 / 第一部分 邪恶的概念魔法	
15 / 一、同一性和非同一性	
26 / 二、辩证法与外在物	
36 / 三、社会学和哲学概念	
45 / 四、文化批判的使用和误用	
52 / 五、本雅明和星从	
63 / 六、模型	
67 / 七、语句和模仿	
78 / 八、康德和否定的辩证法	
82 / 九、自由模型	
95 / 十、历史模型	
102 / 十一、自然历史	
121 / 十二、形而上学模型	
133 / 第二部分 水手寓言	
135 / 一、对客观物的偏见	
139 / 二、艺术的罪过	

- 152 / 三、左翼文化的变迁
158 / 四、作为大商业的大众文化
165 / 五、文化工业叙事
- 171 / 第三部分 单子的生产性
173 / 一、唯名论
182 / 二、表象的危机
195 / 三、物化
201 / 四、开放的闭合单子
210 / 五、生产力
219 / 六、生产关系
224 / 七、主体、语言
236 / 八、自然
245 / 九、真理内容和政治艺术
- 253 / 结论 后现代中的阿多诺

- 280 / 注释
297 / 索引

~导 论~

时间川流中的阿多诺

本书是对阿多诺在其生涯的不同阶段,部分或全部由他写作的以下三部主要著作的精细解读:1947年出版的《启蒙辩证法》,1966年出版的《否定的辩证法》,及其遗著《美学理论》。而且我还宽泛引用其他著作:被称作《文学札记》的论文、《最低限度的道德》、论瓦格纳的书,以及其他相关材料。我把他的这些作品看作同步地完整展现的体系的各部分,仿佛青年的和衰老的(如在2001年)不同阶段的阿多诺们都一起“围坐在大英博物馆的一张桌子旁”。

不管是在礼仪、国民人口,还是在个别活跃心灵的历史编纂上,对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判定都不是经验判定;如我在其他地方所提到的那样,这种判定被预先看作一种绝对前设,它因此决定你随后对材料(有时称为“事实”)的解读和阐释。今天我们更有责任明白,目睹了反革命历史编纂大潮涌起的我们,决意去“证明”:例如,法国和俄国革命,除了以其疯狂的血腥打断了常规发展、运行良好而和平的经济进步之外,一无是处。如此的“历史”起到了真实的布莱希特式陌生化效果,它以常识(即我们已接受的思想)的面目呈现,使我们要论证一些新的东西:如果它亦包含了对于时代划分本身的再思考,这论证将最具建设性,这种再思考已成为时代的中心理论议题之一,而当前这个时代基本上是非历史的,并渴求对所有事情的历史叙事以及叙事性再阐释——可以是对后结构闲扯(包括更新的历史)的强烈渴望,这闲扯有点是对不会长久偏离历史的失重状态的补偿。

这种选择——即以各种相应好莱坞和电视文献片风格所作的、对阿多诺在以下不同阶段生涯的说明,包括作为它的强制性背景的战争期间从欧洲到北美令人激动的旅行,以及战后回到一片废墟的德国(随后在60年代发生了一次学生运动)——一般忽略了哲学或美学因素,阿多诺的毕生坚持并不难展示,²而且这一选择还集中于更易理解的政治观点,或者说,他什么时候停止过信仰马克思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即使霍克海默和“学派”在此是不可回避的学术和资财背景,“他们”何时放弃过信仰马克思主义?)我将反驳下列非常肤浅的观点,即关于政治使命的、

意识形态选择的，以及哲学和文学生产的本质的观点。背叛实际很多，并且是很好的戏剧素材；但这根本不是发生在冷战期间和阿登纳时代德国复苏之后阿多诺身上的事情。事实上，他在继续写作两本主要著作，即本书正在研究的，把他确立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一的工程。并且正如本书标题所提示的，本书的写作即要证明阿多诺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其实，与其说是人变了，不如说是情境发生了变化。这同样能解释在我本人眼中阿多诺的变化，以我之见，他的著述本身明显随历史年代而变化：对我来说，阿多诺是在艾森豪威尔时代衰退年代中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方法论发现，当时创造某种本身在北美语境下的辩证法概念显得任务紧迫。这也是我把阿多诺的音乐分析（对此我在本书不再回顾）作为对以下手段的实际证明的时代，即我们称作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即阶级和意识形态背景——对于形式分析工作不仅不是外在的，而且恰恰是内在的。然而，《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一书的读者会感到，我更加远离了 1971 年此书最终出版时我对阿多诺的判断，即他对苏联、第三世界和本国黑人运动（我亦像别人一样匆匆地以他关于爵士乐的论文看他的态度）的敌视。但在那个新年代，即 60 年代，则意味着（至少是对我来说），对所有此类事情的同情。在民族解放战争时代，阿多诺的天启意识，聚焦在仿佛时代仍处在奥斯维辛的时刻，并且困扰于命中注定和有害的“总体体系”的魔法中，的确显得十分退步。这个体系在“前革命”时代已被声名狼藉地定义为“凡事皆可能”（tout est possible）的含义，在我们自己不远的未来，极少有人会觉察到它的迫近。

70 年代——至少在美国，是理论和理论话语的以及“享乐”（louissances）的时代，它们的范围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毛主义到叙事分析，从力比多投资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实质上是法国式的。阿多诺（与卢卡奇和其他很多中欧思想家一起，除了本雅明和布莱希特明显例外）在那个斗争时代中，不要说尴尬，显然就是个累赘，并且激起那些

仍旧对他烦琐注解的人把他与德里达式的正统相“调和”。然而如此一来,法国精英与此同时处于全面去马克思化的过程中;所以下一个十年揭下了幕帘,打开了一个富足和平及去政治化的欧洲,她伟大的理论家死去了,本土的哲学传统被埋葬掉了(在本卷的结论中我将谈论更多今天在联邦共和国中阿多诺和辩证法的命运)。通过学习分析哲学和开创它自身的商业管理和国际贸易形式,后现代的美洲对那个欧洲产生了回响:迅速丢掉它的工业,但主导一个全新的世界经济体系,即便前苏东集团显然渴望跨跃进去的体系。

最终,在这个行将结束但仍然属于我们的十年中,在这里,阿多诺对“总体体系”的预言注定以完全未曾预料的方式变成现实。阿多诺确实不是 30 年代的哲学家(我担心回过头来看,海德格尔不得不被认定为是 30 年代的哲学家);也不是 40 或 50 年代的哲学家;甚至也不是 60 年代的思想家——那些分别被认为是萨特和马尔库塞;并且我已经说过,在哲学上和理论上,他的老式辩证话语在 70 年代是不合时宜的。但还是有机会证明他是我们自己时代的分析家,虽然他不能活着看到这个时代,并且在这个时代,晚期资本主义几乎已成功清除了自然和无意识、颠覆和美学,以及个体和集体实践最后的漏洞,并且迅速地成功清除了由此不再存在于从今以后后现代图景之物的任何记忆痕迹。现在对我来说可能的是,阿多诺的马克思主义,它在先前阶段中并没有多大帮助,可能恰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东西。我将在我的结论中回到阿多诺和后现代的东西之间的联系。

然而,至于马克思主义,未免轻浮的是继续认为,任何惊讶于把阿多诺概括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并没有读过他太多公认难懂的作品,并且大多可用的二手讨论都倾向于拒斥马克思主义,仿佛它是一套奇怪的、后当代讨论不再需要考虑的时代风俗。但是那些人——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马克思主义者本身——认为争论阿多诺马克思主义的程度和本真性是有趣的(如果他真的不是黑格尔主义者,反过来,他就是个后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短暂地回顾一下在科学和意

意识形态之间的原有区分是富有意义的，今天这个区分已经像很多其他东西一样声名狼藉。“要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然包含这种信仰，即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是一门科学：那就是说，一种公理、研究原则，一组与众不同的知识和程序（关于此，如果我们去发展这个论点，有人也会想说，它作为一种话语有着独特的地位，这话语不是哲学的和其他写作类型的那种）。

然而所有科学，不仅仅投射了意识形态，而且投射了大量可能的意识形态，并且这是在正面含义上被理解的：意识形态是某种特有实践的运行理论，同样是这个实践的“哲学”，以及那动员它并给它一个伦理学和政治学（另外还有美学）价值和观点的集合体。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有许多马克思主义，并且众所周知互不兼容——恰恰是：在历史上和具体历史情境中的马克思科学之诸种局部意识形态，这些情境不仅规定了这些意识形态的优越性，而且规定了它们的局限性。那么，说列宁的、切的、阿尔都塞的，或布莱希特的（当然还有佩里·安德森的和伊格尔顿的，更不用说自己的了）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的，在这个术语的批判含义上现在仅仅意味着：每一种马克思主义，从包含了它的倡导者的阶级规定和文化的及民族的视野（除别的东西之外，视野包括了所讨论的某一时期工人阶级政治的发展）这点来看，都是具有特殊情境的。

至于阿多诺的马克思主义，明显也是由所有这些过去被称为“要素”的东西所决定的（也就是说，限制的）。奇怪的只是，诸如历史唯物主义的那个立场——历史情境的首要性对于它是核心性的——面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这种多元性，应该像任何“资产阶级哲学”显示同样多的费解性。以这种精神确认阿多诺的马克思主义，确实并不意味着把他的立场作为一套方案来接受（的确，阿多诺哲学作品中的很多东西恰恰引发了我们要如何理解一种历史上不再流行的活的思想的问题）。特别地，他的政治艺术观对一些人来说已经是一个绊脚石，这些人忘记了哲学观点是他为了让一个现在不合时宜的、现代主义本身更深层的政治使

命的概念继续保持活跃所付的代价。他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态度明显地受阶级条件所局限(正如他对第三世界革命缺乏同情或者理解一样);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本身经历重要转型的时期,它们不会再羁绊我们,除了对冷战期间左翼知识分子困境的历史验证。但是他对60年代学生运动的同情显然要比他愿意公开表达的更多³(这种同情被他把警察召进大学里这永久的羞耻大大损害)。

但任何对阿多诺政治立场的评估必须同样不能忽略他的学术实践——他在成为联邦共和国的地方对战争中幸存的思想生活系统介入(涉及到希特勒的大学中任何有影响力的学术幸存者),而且他特别积极承担社会学重建的责任——对于先前是音乐方面的美学家和专家的他来说,这是一个完全不同寻常的命运转折。阿多诺对社会学本性和功能(它构成了从《否定的辩证法》到《美学理论》第三个遗漏的术语,并且我将会在第一部分的过程中讨论它)有力和庞大的论辩以及准确说明(mises au point),显然包含了两个阶段或并存的前提。所谓的法兰克福学派回到了——合法地和非法地⁴——被美国经验研究的威望所包围的德国:阿多诺能够使用这种经验研究重击德国社会哲学中更形而上学的敌人,但同时也攻击经验主义本身(以及实证主义),并且反过来使它屈从于辩证法的批判(他在社会学作品中比在哲学作品中更大量使用的一个词语)。我们今天已经对那些作为专业和学科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意义和客观变迁有了一个敏锐得多的感觉,这些东西应当让我们在评价就阿多诺来看现在被称之为这个领域内本真的实践形式时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这些教训也都没有过时,即使辩证法对西德地盘的短暂胜利显然已经让位于新的和非辩证的潮流——哈贝马斯的潮流,它当然批判地来源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然而把它们修正得无法辨认了⁵——以及多种多样的盎格鲁-美国式影响的潮流,它们对辩证思想都是断然敌意的。但是——除了在人类学中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世界性影响在变革这门学科中有略微可比的地位——其他的社会科学,除非我错了,似乎